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 朱寿桐 著

文学与人生 十五讲

没有文学的人生虽然依旧是一种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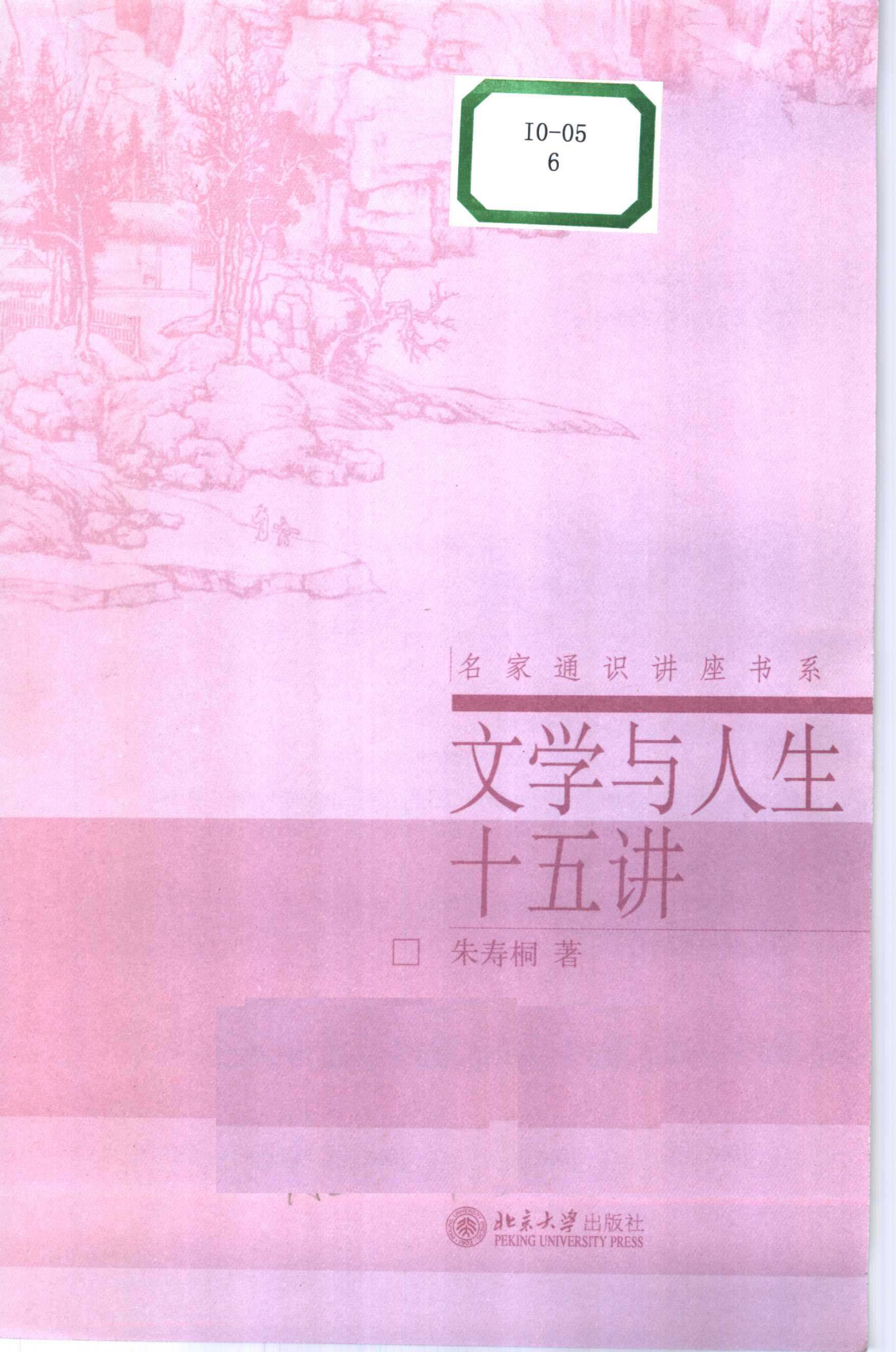
但可能是十分枯燥、十分粗糙的人生。

没有文学的人生不是高质量的人生。

文学是人生质量的体现。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0-05
6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文学与人生 十五讲

□ 朱寿桐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人生十五讲/朱寿桐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ISBN 7-301-09089-7

I. 文… II. 朱… III. 文学-关系-人生哲学 IV. I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3576 号

书 名: 文学与人生十五讲

著作责任者: 朱寿桐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089-7/G·149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3 印张 32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套大型多学科普及读物。全套书系计划出版 100 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二批近 50 种将在 2004 年内出齐。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书系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来自全国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主持各书的撰写。到目前为止,这是同类普及性读物和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

本书系的定位是“通识”,是高品质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的要求,同时也是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而设计的讲座类书系,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通识课(通选课)的教材和课外读物。

素质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趋势。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全国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推行学分制改革,改变本科教学以往比较单纯的专业培养模式。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通识课(通选课)的内容和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专业课程,包括供全校选修的通识课(通选课)。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学校虽然在努力建设通识课,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少统一的规划,到底应当有哪些基本的通识课,可能通盘考虑不够;课程不正规,往往因人设课;课量不足,学生缺少选择的空间;更普遍

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适合通识课教学的教材,有时只好用专业课教材替代,影响了教学效果。一般来说,综合性大学这方面情况稍好,其他普通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医、农类学校因为相对缺少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加上很少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开设通识课的困难就更大。

这些年来,各地也陆续出版过一些面向素质教育的丛书或教材,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到底应当如何建设好通识课,使之能真正纳入正常的教学系统,并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这是许多学校师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由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起,联合了本校和一些兄弟院校的老师,经过广泛的调查,并征求许多院校通识课主讲教师的意见,提出要策划一套大型的多学科的青年普及读物,同时又是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这项建议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的支持,并由他牵头,组成了一个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有相当影响力的编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有效地联合了许多重点大学,协力同心来做成这套大型的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历来以出版高质量的大学教科书闻名,由北大出版社承担这样一套多学科的大型书系的出版任务,也顺理成章。

编写出版这套书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国各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源,通过本书系的编写、出版和推广,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通识课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中,使这一类课程的学科搭配结构更合理,更正规,更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从而也更方便全国各大学设计和安排这一类课程。

2001年底,本书系的第一批课题确定。选题的确定,主要是考虑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知识结构的需要,也参考了一些重点大学的相关课程安排。课题的酝酿和作者的聘请反复征求过各学科专家以及教育部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并直接得到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第一批选题的作者当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各大学推荐的,他们已经在所属学校成功地开设过相关的通识课程。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受聘的作者大都是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不少还是学科带头人,科研与教学工作本来就很忙,但多数作者

还是非常乐于接受聘请,宁可先放下其他工作,也要挤时间保证这套书的完成。学者们如此关心和积极参与素质教育之大业,应当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书系的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每一种书都有一定的知识系统,有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专业教科书,不是专业课的压缩或简化。重要的是能适合本专业之外的一般大学生和读者,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的知识,扩展学术的胸襟和眼光,进而增进学生的人格素养。本书系每一种选题都在努力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学问真正做活了,并能加以普及,因此对这套书作者的要求很高。我们所邀请的大都是那些真正有学术建树,有良好的教学经验,又能将学问深入浅出地传达出来的重量级学者,是请“大家”来讲“通识”,所以命名为《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其意图就是精选名校名牌课程,实现大学教学资源共享,让更多的学子能够通过这套书,亲炙名家名师课堂。

本书系由不同的作者撰写,这些作者有不同的治学风格,但又都有共同的追求,既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学习和思考的兴趣。

本书系大都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有意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

本书系的拟想读者主要是青年,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如果用作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考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

本书系每一本都是“十五讲”,主要是要求在较少的篇幅内讲清楚某一学科领域的通识,而选为教材,十五讲又正好讲一个学期,符合一般通识课的课时要求。同时这也有意形成一种系列出版物的鲜明特色,一个图书品牌。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既能满足社会上读者的需要,又能够有效地促进全国各大学的素质教育和通识课的建设,从而联合更多学界同仁,一起来努力营造一项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目 录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1

第一讲 文学与人生：一个严肃而轻松的话题/1

一 一个轻松的话题/2

二 一个严肃的话题/10

三 关于话题的展开/14

第二讲 吴宓《文学与人生》论析/20

一 融进自我的人生体认/21

二 人文“礼教”中的歧误/25

第三讲 文学与人生关系的原生态/34

一 原生态文学的追寻/35

二 原生态的文学与人生的关系/40

第四讲 文学：人生的余裕/46

一 综合理论中的人生余裕/47

二 从人生的余裕到余裕的人生/56

第五讲 “为人生”与“为艺术”之争/63

一 对于西方的论争：想象性阐释/64

二 两个概念的自明性应用/67

三 殊途同归的理论/71

第六讲 文学:人生功能的辩证/79

一 价值功能夸大的偏向/79

二 文学无法脱离于人生/87

三 文学的两维功能/91

第七讲 人生情境与文学情境/107

一 文学情境对人生情境的美感提炼/108

二 时空感兴:超越人生情境的“留白”/114

三 时空感兴:超越人生情境的“时差”/125

第八讲 作家的人生体验与文学创作/138

一 奇闻轶事:人生体验的丰富性/138

二 “前25年”:人生体验的深刻性/142

三 各种乘谬的认知/146

四 文学的虚与实/151

第九讲 人生气度与文学表现/160

一 文学中的人生气度/162

二 风格论中的人生气度/168

三 人生观念、人生气度与文学风貌/176

第十讲 人生体验与文学意象/187

一 普泛性的文学意象/189

二 文学意象的翻新与创造/201

第十一讲 文学之于人生的道德力量/217

一 文学中的道德批判力量/218

二 文学中的道德感动力量/232

第十二讲 文学道德与人生道德/247

一 走向低俗的人生道德认同/247

二 文学内外的道德轩輊/252

第十三讲 文学中人生道德的维度与向度/259

- 一 现代语境下的道德变异/260
- 二 文学表现的道德层次问题/264
- 三 文学:道德的人性向度/267

第十四讲 通俗文学与人生的娱乐要求/273

- 一 通俗文学概念的提出与强调/274
- 二 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286
- 三 现代武侠文学的通俗品性/297
- 四 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与市井人生/309

第十五讲 民间文学:人生本真最近切的表现/320

- 一 民间文学博大的人生蕴涵/321
- 二 民间文学可能达到的人生批判的深度/337

后 记/349

第一讲

文学与人生：一个严肃 而轻松的话题

一个轻松的话题

一个严肃的话题

关于话题的展开

我讲的这个话题讲过的人很多，正在讲或将要讲的一定也不少。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讲题目，也很可能是许多文学青年和文学爱好者感兴趣的题目。不需要多少特别的阅读经验，作为研究文学的人，我们置身于人生之中，这也就足够了。

“文学与人生”这个话题，初听起来觉得很浅显、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在经历和体验各自的人生，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年龄段通过不同的途径接受过文学的熏陶、诱引和影响，对两者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有程度不同的体会。几乎每个从少年时代走过来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师 and 不同职业背景的家长都曾经对我们有过共同的担心，那就是怕我们看不

好的书,怕不合适的书对我们的人生形成不良影响。几乎所有被怀疑和不信任的书都是文学作品。因此,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师 and 不同职业背景的家长在关注和担心少年们看什么书的时候,就已经表露出他们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看法。

其实,文学与人生的话题并不仅仅讨论是否有文学以及哪些文学可以使少年变得无良的问题,里面包含着相当宽泛也相当复杂的内容。这一题目要求我们必须在一个完全敞开的框架内言说文学、言说人生,而且更重要的是言说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不应是一边说说文学,一边再说说人生,将这两个浑然一体的现象抽象为互不黏合的两张皮。

本着这样的思路,我们的言说将始终联系古今中外较为广泛的文学现象、文人轶事与文学作品,从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和美学的多种角度,阐释文学与人生的复杂关系。所言说的观点凝结着本人多年的文学思考与体验,力求带有一定的理论前沿性和相当的个性色彩,当然,也难免存留一些片面与偏激。这后一种留存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留待与青年读者互相交流互相切磋互相砥砺的由头。

于是,我想把这个古老的话题尽可能说得新鲜一点。

所有的人类活动以及人类活动的所有内容都与总体意义上的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说,凡属于人类活动的所有概念、所有范畴都可能并且应该在其与人生的关系上构成一个话题。文学(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欣赏以及文学运作)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其与人生构成的话题也应有其特殊性。从话题的风格来说,既轻松又沉重至少可以算是这一话题的一个特性。

一 一个轻松的话题

当人们设定一个“* * 与人生”的论题模型以后,“* *”部分填上任何概念、任何范畴,甚至任何词语,例如“政治”、“经济”、“科学”、“哲学”、“历

史”、“社会”、“家庭”、“性别”、“言论”之类,都显得非常严肃而沉重,唯独填上了“文学”、“艺术”之类,相对来说会显得轻松一些。

文学与人生的话题之所以会比其他关涉到人生的话题轻松一些,是因为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原本就比较松散,说得更通俗一点:在广泛意义上,人们并不是离开了文学艺术就没有饭吃或者就吃不成饭。如果你是一个文艺家,是一个靠文学艺术吃饭的人,或许是离开了文学艺术就没有饭吃,但对于更广大的人群而言,对于人类总体而言,有文学艺术固然很好,它美化我们的人生,丰富我们的人生,使得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精致更优美,可如果真的没有了那些东西,相信人们照样可以活着,而且也可能活得很好。

与人生关系最为紧密最为直接的是社会生产,包括一切生产力因素和相应的生产关系。最直接的生产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经济、科学、技术等等,还有与生产力的培养和促进有直接关系的教育,都是社会生产所离不开的,也是总体意义上的人生所离不开的。与社会生产力构成紧密关系的是所谓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这些都与人生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然而文学艺术却离这一些都比较远。

文学艺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当作社会意识形态。这样的对待使得文学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获得了相当崇高的地位。回顾一下作家曾经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拥有的巨大公信力,以及他们的组织作家协会在过去的苏联以及中国享有的巨大权力和稳固地位,就能明白文学被当作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这样的权力和地位在任何一个从未将文学当作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度里是不可想象的。在这样一种至今仍然留有深刻痕迹的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得到了官方和舆论的高度重视,文学被同时赋予了相当了不起的价值、意义和使命,于是乎也成了与社会人生关系至为密切的东西。

当然相当多的地方并不承认至少并不强调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但身处其中的文学家有时却觉得有时候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可能不可避免。台湾小说家钟肇政像许多文学家一样看不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不过也同样和许多文学家一样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趋向无可奈何:

文学有这样意识形态的问题吗？有的。这是我们台湾文学非常特别的地方。欧美、日本的文学并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个人还认为在文学作品或其它的艺术，意识形态并不是需要的东西，假使有，也是泡沫，终究是要破灭、消失的。唯独台湾的文学在这方面非常特殊，统独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探讨清楚，这是因为台湾过去有五十年间被殖民的历史，战后虽然说是光复了，事实上也等于被殖民的状况，跟日据时代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1]

这段话提出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命题。一方面钟肇政为台湾文学染上意识形态化的色彩感到奇怪，感到特别，感到不可理解，另一方面他的论述又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意味，包括认为光复以后也还等于被殖民的状况。无论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至少可以说明，在一个号称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并不需要的作家的嘴里，有时意识形态的东西还是难于避免，可见文学之于意识形态的联系本质上可能还相当紧密，至少是相当复杂，不是说剥离就能剥离开来的。

钟肇政认为意识形态的纠结是台湾文学的特殊现象，可能也不尽然。相比之下，更加重视文学意识形态的地方实在很多，只不过人们常常处在检讨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趋向之中而已。

确实，文学的意识形态化理论已经或正在受到文学批评界的怀疑、反思乃至谴责，有的理论家仍将文学定位在“审美意识形态”^[2]的意义上，正如钱中文在所著《文学原理——发展论》中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阶级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及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的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与以前理解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功能和性质的偏差，社会价值感自然无法与同政治密切联姻的社会意识

形态相比,更不用说对主体提出“使命”的要求了。

将文学定位为社会意识形态,从理论上说是社会对文学的重视,使得文学在社会人生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不过从客观效果上看,对文学的发展和自身建设并非十分有益。文学艺术是人类生活中精神创造的奇葩,它的产生,它的发展,它的繁荣,都需要一定的适宜的生态条件。它需要天才,需要灵感,需要许多偶然得之的心理触动,当然还需要独特的艺术手段或技术方法的创新,这一切都不是靠社会重视所能够获得的。一定的文学艺术犹如特定的花朵,它的绚烂的绽放除了必须具有的自身条件之外,还需要它所适宜的土壤,它所适宜的气候,它所适宜的水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应有的生态。这种生态不是行政手段、人为重视乃至理论强调所能建立起来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其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工程,不如说是一种自然生长的过程,任何意义上的重视、提倡乃至奖励、惩戒等等都不足以对之形成相当效用的影响。

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说,它的繁荣往往都不是社会重视的结果。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明清小说的总体繁荣,很难说都是当时社会重视的结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过“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这一著名命题,揭示出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文学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很可能是在社会一般发展比较低迷的时候。“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3]这就是说,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有时是任何外在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无法决定乃至左右的。

就文学创作的个体经验而言,伟大作家和诗人的不朽作品也都不是社会重视或行政扶持的结果。文学的历史有时恰好提供了反面的教训:过分的行政扶持或过于集中的社会重视,往往不利于巨大文学成就的形成,甚至对文学发展有害。外国的所谓“桂冠诗人”,中国历史上相当多的宫廷诗人,其在文学史上留下的痕迹常常是少之又少,浅而且浅;哪怕是非常杰出的文

学家,一旦“桂冠诗人”或宫廷诗人的“黄袍加身”,往往就难以创作出与其才华相匹配的作品来,曾经有过这种经历的李白就是典型的例子。现代中国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一段时间内,文学被当作社会意识形态,当作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求几乎每个人都能写诗,要求村村都有文艺创作、大演大唱,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当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之后,文学就必然会担负起自己所无法负担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这种“过多负重”现象对于文学的正常发展和繁荣并不有利。在素来重视意识形态的社会体制里,文学的宣传教化作用一向都得到强化,结果却往往不能因此留下传之后世的杰作,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现代文学在这方面应该说有着比较深刻的教训。有时候,文学的意识形态化被强调到极点,文学不仅为政治服务,还要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要求的那样,“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是在特定的革命时代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的特定立场所提出的要求,不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则被视为文学艺术应有的素质,甚至是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具备的品质,于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甚至政治工具化倾向特别严重,所产生的作品往往更多地体现着历史的认识价值。

我要说的是,我们以前的印象中似乎只有重视意识形态的共产党才这么“功利”地理解文学的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工具性,其实只要“政治”需要,任何“政治”家都会对文学艺术提出这样的要求。上个世纪60年代,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了《当前文艺政策》,也明确提出提倡“积极推进三民主义新文艺建设”,“促进文艺与武艺合一,军中与社会一家,以发挥文艺的教育功能,扩大文艺的战斗力量,适应国防民生的需要”。要求文艺家“强化文艺的敌情观念,坚持文艺的反共立场”,“汇合自由世界光明正大的文艺力量,力挽偏激、淫靡、颓废的文艺逆流,导向三民主义新文艺的

主流”，如此等等。^[4]其结果，固然是造成了相当的声势，但以此为指导思想创作的文学作品还有多少被人提起或是被人记起？

当文学的意识形态作用被夸大以后，当文学之于社会和政治所可能负担的责任增大以后，文学相应的厄运也就可能增多。历史的教训已经作了这样的证明，政治家完全可以凭借他的判断认定某一部作品犯了滔天的错误，进而追究作者甚至整个文艺界的责任。毛泽东当年要发动某种政治清算运动，往往就先从读文学作品开始，他能够从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中看出了某种“反党”的意味，并不无嘲讽地说：“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

中国 20 世纪中期的政治运动，常常总是从文学批判着手。建国初期，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以批判“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以及文学学术著作《红楼梦研究》打响了开场之锣；批判“胡风集团”的斗争与“镇反运动”紧相呼应，文艺界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又以对《洞箫横吹》、《我们夫妇之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的批判，以及对丁玲等人的“再批判”为前奏和内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署名“三家村”的几则小品文的声讨拉开序幕。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与那个时代社会过分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意义，过分重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关。当文学的作用在这种观念下被夸大以后，一般来说给文学带来好处的可能不是太大。而且，另一方面，文学创作是高度精细的精神创造活动，高层次高水平的文学创作是卓越的灵感、特异的天才在一定的情感世界里自由呼吸、自然发生的结果；寂寞应是文学的常态，孤独是文学的伴侣，普遍的社会重视、热闹的群体关注，往往并不利于这种高层次的文学作品的出炉。

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人生的余裕的体现，其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应该颇为松散。特别是在不寻常的年代，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与社会人生之间关系的紧密，往往并不明智。鲁迅就曾对这个问题作了形象的解剖。他 1927 年 4 月 8 日到黄埔军校去演讲，语出惊人，认为在革命的时代，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